論　著

五四時期的《新婦女》雜誌研究 *

姚　　霏**

摘　要

誕生於五四時期的《新婦女》雜誌，以西方女權主義的理論解讀中國婦女的生存狀態，通過論說文、詩歌、小說、劇本等多種形式探討五四時期熱門的婚姻、家庭、勞工等問題，提出打造新婦女以改進現社會的設想，並在後期鼓吹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成爲第一份以婦女期刊形式提倡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雜誌。

通過對《新婦女》雜誌細緻地梳理和分析，文章認爲，儘管《新婦女》雜誌存在理論張力不足、實際影響有限等問題，但其深入淺出、清新親合的特點征服了以女學生爲主的廣大受眾，成爲五四時期可圈可點的新文化期刊。同時，由於《新婦女》雜誌既追求新文化報刊的意義和價值，又呈現出女校校刊的獨特氣質，成爲可以全面解讀五四婦女解放思潮實際情況的典型樣本。更重要的是，創刊於五四時期的《新婦女》是對《新青年》等報刊中

*　本文受上海市教育委員會「晨光計畫」項目（編號：11CG51）資助
**　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傳播的新文化思潮的自覺反饋。作爲接受五四新文化啓蒙的知識份子，《新婦女》的編輯群從「被啓蒙者」轉變爲「新的啓蒙者」，成爲女學生接受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導師。女學生在男性知識精英話語的影響下表達對教育平等、戀愛自由、社交公開等的強烈願望，展示了一個眞實的啓蒙過程。即使後期出現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本身也是五四新文化思潮影響《新婦女》雜誌話語變化的表現。從傳播史的角度，《新婦女》有著獨特的研究價值。

關鍵詞：《新婦女》、「新婦女」、五四啟蒙、性別話語、馬克思主義婦女觀

一、前　　言

婦女報刊是展現近代中國婦女解放思潮的重要載體。但長久以來，學界對其研究較爲薄弱。劉人鋒在《中國婦女報刊史研究》的導言中提到：「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婦女報刊卻是一個不大爲人重視的研究領域，全面系統地研究更是少見。」[1] 雖然，劉人鋒忽略了大陸以外學界在婦女報刊研究領域的貢獻。[2] 但就相對大量未被解讀的婦女報刊和近代中

1　關於目前學術界，特別是大陸史學界對近代婦女報刊的研究情況，可參見劉人鋒，《中國婦女報刊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導言頁 2-4。

2　美國學界對近代中國婦女報刊的研究從未停歇。早在 1975 年的 *Modern China* 上，Charlotte L. Beahan 就發表了文章“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Chinese Women's Press, 1902-1911”。以李歐梵為首的團隊，以《良友畫報》作為解讀近代上海城市現代性的文本，其論著“Shanghai Modern: The Flow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引發《良友畫報》的研究熱潮。特別是其中的女性形象，成為臺灣與大陸學界婦女史研究的新熱點。如 2008 年臺灣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的王之瑜就完成了碩士論文〈從《良友畫報》看近代中國女性服飾變化〉。伴隨哥倫比亞大學將《玲瓏》雜誌電子版上網開放，《玲瓏》雜誌研究如火如荼的展開。Hsiao-Pei Yen 的“Body Politics, Modernity and National Salvation: The Modern Girl and the New Life Movement”; Yunxiang Gao 的“Nationalist and Feminist Discourses on Jianmei (Robust Beauty) during China's 'National Crisis' in the 1930s”以及 Barbara Mittler 的“In spite of Gentility: Women and Men in Linglong (Elegance), a 1930s Women's Magazine”三

國婦女史研究的現狀來看，這一判斷基本無誤。於是，在研究近代婦女解放思潮和婦女運動的過程中，出現了婦女報刊「缺席」的狀況。以中國大陸學界爲例，即使是被視爲婦女解放重要階段的五四時期，仍多以《新青年》、《新潮》、《民國日報・覺悟》等報刊中涉及婦女問題的文章爲分析對象。目前中國大陸研究五四時期婦女解放運動最基礎的史料是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的《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中國婦女出版社 1981 年版）。該書收錄的文章，大部分源於五四時期著名的新文化刊物或報刊的婦女問題版；眞正屬於婦女期刊的，僅收錄《婦女雜誌》、《新婦女》、《女界鐘》等，忽視包括女校刊物在內的廣泛的五四婦女期刊來源，從而侷限了大陸學界對五四婦女解放思潮實際情況的認識。這裡既有婦女期刊存世較少、收集不易的因素，也有婦女期刊文章觀點創新不足、理論深度有限、五四特徵不明顯而被刻意忽略的原因。前者隨著近幾年婦女期刊的不斷整理，特別是《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彙編》一至三編（線裝書局 2008 年版）的出版有望解決，後者則需要我們改變刻板印象，對五四婦女解放思潮的實際情況進行再評價。

1920 年 1 月 1 日，一份名爲「新婦女」的雜誌在上海創刊。[3]《新婦

文分別從身體政治、健美以及思想觀念上對《玲瓏》雜誌進行了分析。臺灣孔令芝《從《玲瓏》雜誌看一九三〇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的塑造》（臺北：稻鄉，2011）是目前對《玲瓏》雜誌研究較全面的成果。近代中國婦女報刊研究的重鎮更有臺灣和日本，臺灣和日本學者對《婦女雜誌》的研究卓有成效。2004 年第 12 期的《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以「《婦女雜誌》研究專號」形式出版，學者們從不同側面對近代中國歷時最長的婦女報刊做出獨到的分析。大陸學界的《婦女雜誌》研究熱潮正是受到臺灣學界的影響。除此之外，Joan Judge 的《婦女時報》研究和劉慧英的《天義報》研究等等也為近代中國婦女報刊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3 近代期刊史上有多份名為「新婦女」的報刊。除本文提到的《新婦女》之外，還有 1922 年 12 月由廣州新婦女雜誌社編輯發行的《新婦女》月刊（現存第一卷第一號）、1925 年 12 月由中國國民黨廣州特別市執行委員會婦女部編輯發行的《新婦女》月刊（現存第一卷第一號、第二號）、1935 年 3 月由天津新婦女社編輯發行的《新婦女》週刊（現存第一卷第一號到第二卷第六號）、1939 年 6 月由北平新婦女社編輯發行的《新婦女》月刊（現存第一卷第一號到第二卷第三、四號）、1945 年 10 月由北平新婦女月刊社編輯發行的《新婦女》月刊（現存第一卷第一號到第三

女》32 開型，為半月刊，由新婦女雜誌社出版，共發行 5 卷 25 號；其中 1920 年發行 4 卷 24 號，1921 年僅 5 月 1 日發行 1 號。這份誕生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婦女報刊，儘管發行時間不長，卻由於後期出現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學說，而成為五四婦女解放思潮研究中常被提及的婦女報刊之一。[4] 目前對五四時期婦女報刊進行系統研究者，首推中國大陸學者劉人鋒。她對 1917-1921 年間出版的婦女報刊進行細緻的搜羅，並對重要刊物作個案分析，其中就有《新婦女》雜誌。[5] 不過，由於作者立足於勾勒近代中國婦女報刊的總體脈絡，在具體個案上往往只能點到為止。特別在《新婦女》編輯群體的考證、《新婦女》與同時期報刊間的交往、以「社會性別」視角進行文本分析等方面有所不足。

本文試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新婦女》雜誌進行細緻的文本梳理和分析，考察這份被烙上「五四期刊」名號的雜誌是如何彰顯，又彰顯了哪些「五四」特質。同時，通過對雜誌編輯群、作者群身份的揭

號，更名《新婦女月刊》後出版第二卷第一號到第二號）。除此之外，名稱相似的還有 1931 年漢口新婦女日報社編輯發行的《新婦女週報》、1946 年李馥清主編、西安新婦女社發行的《新婦女月刊》。詳見伍傑，《中文期刊大詞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下冊，頁 1824-1825。

4 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輯的《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第二集下冊介紹了《新婦女》雜誌，將其定性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範疇」，但「嘗試著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研究中國的婦女問題」，「表現五四以後民主運動的分化和發展」。（頁 180-181）如此一來，才有了上文提到的《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將《新婦女》的多篇文章收錄其中。從目前來看，中國大陸學界多在三類研究中援引《新婦女》的文章：一是探討五四時期的婦女解放觀。近些年來，隨著性別視角的引入，這類課題漸漸分化為五四時期男女兩性知識精英各自的婚姻家庭觀及其異同比較；二是五四婦女解放思潮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特別是與新文學的關係。近幾年，文學界對於新文學形式和婦女問題的結合，特別是「娜拉」形象的出現和變形等研究往往援引《新婦女》的文章；三是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思想傳播史研究，《新婦女》往往作為馬克思主義婦女觀中國化的重要標誌。

5 《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09 年第 3 期刊登了劉人鋒〈《新婦女》與「新婦女」——五四運動時期《新婦女》關於婦女問題的探析〉一文。文章除了介紹《新婦女》的基本資訊，還突出了《新婦女》「宣導婚姻自由」和「將婦女運動與勞動運動相結合」的特質。在《中國婦女報刊史研究》一書中，劉人鋒進一步將《新婦女》的特徵概括為「促成新婦女的誕生」。參見劉人鋒，《中國婦女報刊史研究》，頁 183-190。

示，展現五四時期的男女知識精英是如何運用「五四話語」表達意見和態度，這些話語間又存在著怎樣的相互關係。最後，考察馬克思主義學說是如何進入《新婦女》的話語，並對其在近代婦女報刊史中的地位進行評價。

二、五四語境下的「新婦女」

近代以來，婦女問題成爲社會改良，乃至國族復興的重要內容登上了中國的歷史舞臺。在近代中國知識階層的心目中，打造全新的婦女形象和打造全新的國族形象息息相關。從戊戌維新時期的「賢妻母良」，到辛亥前十年的「國民母」、「女國民」，每一時期理想的婦女形象都與該時期社會改革的目標相互吻合。五四時期也不例外。《新青年》是五四時期最早關注婦女問題的雜誌。[6] 陳東原就曾表示：「婦女有獨立人格的生活，實在是在《新青年》宣導之後，而『五四』是一個重大的關鍵。」[7] 可見《新青年》在打造新婦女形象方面的貢獻之巨。不過，「五四運動」高潮過後，《新青年》出現編輯思路上的分歧，打造新婦女的任務被暫時擱置。而接過這一接力棒的，正是《新婦女》雜誌。

《新婦女》有著鮮明的新文化色彩，刊名中的「新」體現了辦刊者的初衷和理想——「要有新社會，一定要有新婦女」，新婦女當和男子

---

6 《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開始刊登「女子問題」。包括〈哀青年〉、〈賢母氏與中國前途之關係〉（第二卷第六號），〈女子教育〉（第三卷第一號），〈女子問題之大解決〉、〈論中國女子婚姻與育兒問題〉（第三卷第三號），〈女權平議〉、〈改良家庭與國家有密切之關係〉（第三卷第四號）。以上都是列在「女子問題」專欄下的文章。第三卷第五號後出現了專門探討女子問題的文章，如〈結婚與戀愛〉（第三卷第五號），〈婚制之過去現在未來〉（第三卷第六號），〈女子問題〉（第四卷第一號），〈貞操論〉（第四卷第五號），〈娜拉〉（第四卷第六號），〈貞操問題〉（第五卷第一號），〈我之節烈觀〉、〈社會與婦女解放問題〉（第五卷第二號），〈結婚論〉、〈美國的婦人〉（第五卷第三號），〈戰後之婦女問題〉（第六卷第二號），〈終身大事〉、〈男女問題〉（第六卷第四號），〈兒童公育〉（第六卷第六號）。

7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臺北：商務印書館，1990），頁 365。

「共同負擔新社會上一切重大的責任」。[8] 如同陳獨秀在《青年雜誌》創刊號中對青年提出六個方面的要求，[9]《新婦女》一開篇就對「新婦女」下了定義並指明努力的方向：「新社會的婦女，是有完全人格的，有愉快精神的，有正當職業的，是平等的，是自由的，是獨立的，是互助的」。[10] 從雜誌的風格和編輯自述中不難發現，《新婦女》的創刊是受到「五四運動」的刺激，是在新文化大潮的滌蕩和《新青年》等刊物的感召下的自發行爲。[11]「新婦女」的提法，很有可能受到「新青年」的啓發。

在創刊號〈新婦女宣言〉中，雜誌編輯開門見山地交代了創刊的目的和主張，即 ── 掃除現社會上一切阻礙新婦女的思想制度風俗；研究新婦女應當採取的進行方法和應走的途徑；選擇介紹歐美各國關於婦女的新思潮，做新婦女的考鏡；切實調查現社會上各種婦女的生活狀況，做改良的預備。[12] 歷時一年有餘的《新婦女》雜誌，基本貫徹了最初的設想。《新婦女》中的文章包括論說、詩歌、小說、劇本、隨感、譯文、演講 [13] 和調查 [14] 等，可謂形式多樣、內容豐富。每一號雜誌，原則上

---

8 〈新婦女宣言〉，《新婦女》，卷 1 號 1（1920 年 1 月 1 日），頁 1。

9 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敬告青年〉，《青年雜誌》，卷 1 號 1（1915 年 9 月 15 日），頁 2-5。

10 〈新婦女宣言〉，《新婦女》，卷 1 號 1，頁 1。

11 靜觀，〈告新文化運動的同志〉，《新婦女》，卷 1 號 2（1920 年 1 月 15 日），頁 31-32。

12 〈新婦女宣言〉，《新婦女》，卷 1 號 1，頁 1。

13 杜威夫人演講的〈男女同校〉、勃拉克演講的〈俄國底美術與教育〉被刊登在第四卷第四號的《新婦女》雜誌上。

14 第一卷第一號上，曙梅做了關於上海婦女生活的調查。他將上海婦女分為兩萬多「一些兒不做事情的」、約二十五萬「終日管理家務的」、約三十萬「有正當事業的」、約十萬「做不正當事情的」和四五萬「給人家役使的」。「有正當事業的」的婦女又包括了學生一萬多人、教師三四百人、醫生和看護婦三四百人、從事編譯和宣教的二三百人、從事音樂和繪畫的一百多人、商人二千多人、從事船户漁人生涯的五六百人、農婦兩萬人左右、女工二十五六萬、伶人四五百人。當然，作者自己也知道這種統計調查只是粗略的，「讀者諸君如有精密的報告寄來發表，本志很歡迎的」。除此之外，第三卷第五號的〈浦東婦女底生活狀況〉以及第一卷第五號的〈日本的婦女〉、〈麻六甲的婦女〉，或為調查所得，或為采風所獲，反映了各地婦女

以論說文爲中心，涉及一類婦女問題。如第一卷第五號圍繞家庭問題，第二卷第二號和第六號圍繞婚姻問題，第二卷第三號和第五卷第一號圍繞勞工問題，第三卷第四號圍繞教育問題，第四卷第一號圍繞參政問題等。應該說，這些都是五四前後被新知識界頻頻曝光在大眾面前的婦女問題，且這種分專題論述的方式，已被以《新青年》爲首的許多報刊雜誌所使用。《新婦女》的編輯正是在「五四運動」高潮前後集中關注《新青年》等刊物，繼承了《新青年》的編輯思路。[15]

在《新婦女》雜誌所討論的婦女問題中，出現頻率最高、論說最有力的是婚姻家庭問題。這顯然受到五四新文化話語的影響。早在 1917 年第三卷第五號的《新青年》雜誌上，就刊登了美國著名無政府主義者高曼(Goldman)的〈結婚與戀愛〉。這篇徹底否定婚姻制度、主張戀愛自由的檄文，和辛亥前後一些叫囂廢除家庭、廢除婚姻的無政府主義主張一樣，並未在尚處新文化運動初期的中國社會掀起巨浪。但借由《新青年》的特殊效應，漸漸使得「自由戀愛」成爲五四時期衡量社會文明與否的尺度之一。[16] 1918 年，周作人翻譯與謝野晶子的〈貞操論〉，胡適、羅家倫翻譯易卜生的劇作〈娜拉〉，胡適的名篇〈貞操問題〉和魯迅的檄文〈我之節烈觀〉相繼發表，掀起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關於婦女問題的討論高潮。其中，最振聾發聵的聲音源於對傳統婚姻家庭制度的批判。

和當時很多新文化運動期刊一樣，《新婦女》以較大的篇幅對傳統

的生活情況。

15 《新青年》第六卷第四號封一廣告中，刊登了名為「女子問題」的新青年記者啟事，其中提到：「本志於此問題，久欲有所論列。只以社友多屬男子，越俎代言，慮不切當。敢求女同胞諸君于『女子教育』、『女子職業』、『結婚』、『離婚』、『再醮』、『姑媳同居』、『獨身生活』、『避妊』、『女子參政』、『法律上女子權利』等關於女子諸重大問題，任擇其一，各就所見，發表於本志。一以征女界之思想，一以示青年之指標。無計于文之長短優劣，主張之新舊是非，本志一律匯登，以容眾見。記者倘有一得之愚，將亦附驥尾以披露焉。」由於五四高潮的快速到來和編輯群體日漸明顯的分裂傾向，《新青年》沒能將這一設想進行實踐，但很可能觸發了《新婦女》的創刊。

16 劉慧英，〈從《新青年》到《婦女雜誌》── 五四時期男性知識份子所關注的婦女問題〉，《中國文化研究》，春之卷(2008)，頁 125。

婚姻制度進行批判。在妙然看來，中國的婚制之所以落後卻又得以延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父之母命，媒妁之言」。而在當時社會，如果青年的婚姻還「要經父母的允許，媒妁的說合」，不僅箝制了青年的自由意志、「滅殺人格的尊嚴」，且與喚醒青年的覺悟、與社會的改造完全矛盾，可謂「妨礙新文化的進行」，並「增加經濟的負擔」。[17] 因此，妙然提出要改良婚制，包括杜絕父母的干預、廢除媒妁、禁止早婚、改良婚儀、廢除聘金和妝奩、規定離婚法，以「發展人生精神的快樂，除去形式的、不平等的習俗，達到實際的、平等的婚姻」。[18] 在〈婚姻問題的三個時間〉中，陸秋心將家庭制度與經濟組織形式相連結，提出婚姻問題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他從經濟基礎的變革出發否定包辦婚姻，認為中國的禮教是建立在農業經濟組織基礎之上，且適應於大家庭制度。然而在西方工業經濟傳入中國後，中國的農業經濟組織已經被推翻，因此「我們一定要拋棄一切不適宜於這新經濟組織的禮教風俗。所以我們萬萬不能再行大家族制度，萬萬不能再講父母之命。」[19] 在〈婚姻自由和德謨克拉西〉中，陸秋心進一步將三種婚姻制度與三種政治體制聯繫起來：完全由父母做主、子女不得過問的專制婚，和君主專制政體對應；由父母提出、取得兒女同意的同意婚，和君主立憲政體對應；絕對不容許有第三者出面干預的自由婚，則和民主共和政體對應。而中華民國是民主共和國，故「要做民國國民，一定要婚姻自由。要擁護德謨克拉西，一定要擁護婚姻自由。」[20] 陸秋心甚至提出未來理想的婚姻模式：居住在男女兩方共同組織的一個新家，男女經濟各自獨立，共同負擔家用、共同處理家務，近血統不結婚，廢姓、廢夫人稱謂，實現男女平等。[21] 當然，

17 妙然，〈婚制改良的研究（上）〉，《新婦女》，卷 1 號 3（1920 年 2 月 1 日），頁 4-5。
18 妙然，〈婚制改良的研究（下）〉，《新婦女》，卷 2 號 2（1920 年 4 月 15 日），頁 9-16。
19 陸秋心，〈婚姻問題的三個時間〉，《新婦女》，卷 2 號 2（1920 年 4 月 15 日），頁 2-6。
20 陸秋心，〈婚姻自由和德謨克拉西〉，《新婦女》，卷 2 號 6（1920 年 6 月 15 日），頁 2-3。
21 陸秋心，〈婚姻問題的三個時間〉，《新婦女》，卷 2 號 2，頁 7-8。

改造舊婚制，除了要爭得結婚的自由外，還必須爭得離婚的自由。在〈法律上的離婚問題〉中，沈靜虛對比了各國的新律和中國的法律對離婚的規定，認爲「非但禁止離婚，絕對不能通行，呈訴離婚也應該改良。就是無論那一方面，起了離婚的訴訟，如果理由正當，法律便不該和解。」[22]

婚姻問題指的不只是未婚男女的戀愛結婚，還包括已婚男女喪偶以後的戀愛結婚。因此，討論婚姻問題必然會涉及貞操問題。貞操問題是五四時期非常重要的一個婦女問題。在封建制度下，女人必須爲死去的男人守節，而男人卻不需要講貞操，由此引發《新青年》對這種單方面要求女性貞操的猛烈批判。《新婦女》基本承繼《新青年》關於貞操問題的觀點，提出「生前夫婦沒有愛慕的意思，難道死了便誠心守節麼？」，「男子能續娶，女子不能再嫁，這豈不是不平的事麼？」[23] 因此，〈婦女的再醮問題〉中，沈靜虛認爲「守節與再嫁必須任婦女發表自己的意思，外邊的人絲毫不可干涉的」，「在婦女一方面，亦必將他的誠意表現出來，斷不可礙於親戚的牽制、社會的輿論，反使自己精神上受無窮的痛苦。」[24] 相對的，《新婦女》提出男子也應保持貞操的觀點。在〈消滅「妾」和「妓」兩個字〉中，陸秋心表示「我是主張一夫一妻的」，表達了對納妾、嫖妓的堅決反對。在他看來，「夫妻在訂婚以後，離婚以前，應該大家保持貞操」，而且「未結婚的人可以從朋友的地位轉成夫妻的地位，已婚未離的人斷不能在朋友的地位上進而有夫妻的行爲」[25] 這種比較全面的貞操觀超越了《新青年》的觀點，表現出一定的先鋒意識。

鑒於《新婦女》的目標是通過打造新婦女來創造新社會，那麼，爭取婚姻自由就只是婦女爭取獨立人格的第一步。要成爲一名眞正的新婦女，還有很多束縛需要打破，首要的就是舊家庭。妙然認爲，「新婦女是

---

22 沈靜虛，〈法律上的離婚問題〉，《新婦女》，卷 2 號 6（1920 年 6 月 15 日），頁 11。

23 沈靜虛，〈婦女的再醮問題〉，《新婦女》，卷 1 號 6（1920 年 3 月 15 日），頁 15。

24 沈靜虛，〈婦女的再醮問題〉，《新婦女》，卷 1 號 6，頁 15。

25 陸秋心，〈消滅「妾」和「妓」兩個字〉，《新婦女》，卷 1 號 1（1920 年 1 月 1 日），頁 32-33。

有完全人格，爲社會上一個有用的人；舊家庭是厲行專制，束縛自由，爲社會進步的障礙物」、「新婦女與舊家庭，是絕對不能相容的」。[26] 舊制度下的大家庭，被認爲是新婦女的對立面。在大家庭中，婦女先是處於長尊幼卑結構的底層，後又進入男尊女卑結構的底層，勢必遭遇更多的壓抑和苦痛。陸秋心視舊家庭制度下婆媳、姑嫂、妯娌間的矛盾爲「殺人的兇器」，提出要改革家庭形式，提倡實行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制度。[27] 濟蒼則研究家族成員同居和分居的歷史，提出分居形式歷來有之，爲小家庭制度的實踐找到歷史依據。[28]《新婦女》還刊登改良家庭生活的設想，如仰堯在〈家庭俱樂部的商榷〉中提出應採取家庭俱樂部的形式，「改良舊生活、實行改良風俗、實行社交公開、發展互助精神、實行交換知識、革除不良的嗜好、節省無謂的浪費」。[29] 而如果要徹底將婦女從家庭中解放出來，濟蒼認爲，兒童公育和會食是最理想的方式。[30]《新婦女》雜誌對改造舊家庭話題的熱衷，從雜誌上刊登的西方論著翻譯便可了然。自創刊號始，陸秋心就陸續翻譯美國人馬騰(Orison Swett Marden)出版於 1915 年的《婦女與家庭》。庸覺也節譯哈立森(Frederic Harrison)的《婦女的將來》。庸覺認爲，「哈立森先生主張社會上家庭的組織是不可廢除的，但是要組織小的家庭，恰和本社宗旨相同。所以我就把他《婦女的將來》節譯了些意思」。[31] 在第一卷第二號上，庸覺介紹其即將著手翻譯的英國人掘拉司台爾(C. V. Drysdale)再版於 1917 年的《小家庭制度》，認爲「這本書所講的，恐怕是吾國將來社會上逃不了的一個問題」。[32] 正是對西方理論的直接吸收，促成《新婦女》在改良家庭生活和改變婦女家庭角色方面的獨到見解。

---

26 妙然，〈新婦女與舊家庭〉，《新婦女》，卷 1 號 2（1920 年 1 月 15 日），頁 7-8。

27 陸秋心，〈婆媳姑嫂妯娌間的血淚〉，《新婦女》，卷 1 號 1（1920 年 1 月 1 日），頁 33-34。

28 濟蒼，〈同居分居底略史〉，《新婦女》，卷 1 號 5（1920 年 3 月 1 日），頁 11-16。

29 仰堯，〈家庭俱樂部的商榷〉，《新婦女》，卷 1 號 5（1920 年 3 月 1 日），頁 17-18。

30 濟蒼，〈兒童公育和會食〉，《新婦女》，卷 3 號 3（1920 年 8 月 1 日），頁 1-4。

31 庸覺，〈哈立森的《婦女的將來》〉，《新婦女》，卷 1 號 1（1920 年 1 月 1 日），頁 15。

32 庸覺，〈小家庭制度〉，《新婦女》，卷 1 號 2（1920 年 1 月 15 日），頁 27。

五四時期另一個重要的婦女解放議題是，培養具有社會意識、獨立自主的新婦女。在〈婦女的思想革命〉中，靜觀提出，「從前婦女的思想，但知道家庭，不知道社會；但知道服從，不知道獨立自主」，以後婦女的思想應該「廢棄從前一切腐敗的道德；尊重自己的人格，發展個人的個性，獨立自主，以適應人生生活。」[33] 要想成爲獨立自主、服務社會的新婦女，接受教育是第一步。五四之後，「男女同校」成爲流行的口號。在〈女子教育的三易五難〉中，靜觀提出女子教育的「五難」，包括態度不明了、思想不開放、自動力薄弱、寬嚴不易適中、不易接洽。之所以出現這些難處，是因爲女子教育和男子教育不同，女學校的教授、訓練、管理和男學校也不同。在他看來，自「六五」運動之後，一般女學生都到社會上服務，她們的態度沒有什麼不明了、思想很開放、自動力也並不薄弱。因此，只要實行男女同校，以上所有難處會自動消失。[34] 同樣，陸秋心也表示女學堂不過是一種過渡時代的辦法，早晚要取消的觀點。[35] 顯然，這一時期的新式知識階層不再簡單地從男女平權的角度提倡女學，而是站在「男女同樣是人」的角度，追究女子在受教育的內容、形式、成效方面具體的不平等。更重要的是，當時的女子教育已經將終極目標放在服務社會上。在〈這是一件做得到的事〉中，濟蒼指出當前中國婦女職業大致分爲兩類，一類是女工，一類是中流以上婦女充當的教員和醫生。在他看來，中流以上婦女的職業範圍太過狹隘，至少應該有以下三方面，即婦女自營的職業、國家和各省所設的機關（如郵政局、電報局、電話局、鐵路局、鹽務處、海關公署等）、私人所設的機關。[36] 爲了鼓勵女性服務社會，對當時政治不抱希望的濟蒼不惜鼓勵女子參政。[37]

---

33 靜觀，〈婦女的思想革命〉，《新婦女》，卷 1 號 1（1920 年 1 月 1 日），頁 5-7。

34 靜觀，〈女子教育的三易五難〉，《新婦女》，卷 1 號 3（1920 年 2 月 1 日），頁 36。

35 陸秋心，〈男女同校〉，《新婦女》，卷 2 號 1（1920 年 4 月 1 日），頁 41。

36 濟蒼，〈這是一件做得到的事〉，《新婦女》，卷 2 號 1（1920 年 4 月 1 日），頁 1-2。

37 濟蒼，〈女子參政問題〉，《新婦女》，卷 4 號 1（1920 年 10 月 1 日），頁 1-5。

綜上所述，作為五四期間探討婦女問題的報刊之一，《新婦女》雜誌秉承了新文化運動的理念，成爲繼《新青年》雜誌之後，傳播婦女解放思想、打造新婦女形象的重要期刊。但我們必須承認，《新婦女》所涉及的婦女問題絕大部分已被《新青年》等雜誌討論過，《新婦女》中的文章大多沒能獨闢蹊徑或提出鞭辟入裏的觀點，無法超越《新青年》的高度；一些文章雖然探討五四時期熱門的婦女問題，卻仍然只能從傳統的人道主義角度出發進行批判，缺乏時代意識和理論深度。創刊不久，《學生聯合會日刊》和《婦女雜誌》都專門撰文批評《新婦女》。特別是婦女報刊界資格較老的《婦女雜誌》，批評《新婦女》「專做人人皆知、報報皆見的話」，文章「膚淺無意」、「極簡極單」、「老生常談」，最後還勸雜誌同人「多讀些書」，不要急於出版。[38] 我們不得不說，這些評價有一定合理性。但平心而論，《新婦女》不是《新青年》。用《新青年》的高度去比照每一份五四時期出版的報刊雜誌，顯然並不公平。事實上，五四時期大量湧現的同人雜誌，很多是對《新青年》等報刊中傳播的新文化思潮的自覺反饋，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時代價值。同時，從五四新文化的傳播效果上來看，淺顯的、老生常談的話題並不一定毫無意義，反而更能起到啓蒙的實際效應。女學生沙學聰曾表示，新文化運動的勢力、婦女解放的聲浪絲毫沒有影響到下層社會的女同胞，希望熱心新文化運動的人做些通俗的文章來啓蒙下層社會，不要專做高深的文章，在知識階級內出風頭。[39] 這或許可以作爲對批評《新婦女》者的最好回應。

三、作為「被啟蒙者」和「啟蒙者」的編輯群

劉人鋒在歸納五四時期婦女報刊特徵時指出：「五四運動時期的婦女報刊絕大多數都是由某一團體、某一組織創辦的，它們以報刊本身面

38 佩韋，〈評《新婦女》〉，《婦女雜誌》，卷 6 號 2（1920 年 2 月 5 日），頁 6。
39 沙學聰，〈可憐的吳媽〉，《新婦女》，卷 2 號 1（1920 年 4 月 1 日），頁 33。

世與傳世，至於背後的主要負責人，往往不可知或並不那麼重要而常常被忽略。」[40] 在《新婦女》的研究過程中，我們同樣遭遇到確認編輯群身份的難題。編輯群的身份和閱歷直接影響報刊的宗旨、風格和水準，確定編輯群的身份有助於我們認識和分析《新婦女》。幸運的是，在對整本雜誌的仔細閱讀過程中，我們逐步找到解開編輯群身份之謎的鑰匙。

在創刊號的小說〈梅花萬歲〉中，陸秋心借妻子之口提到：「這《新婦女》雜誌是你們五個朋友結合起來辦的」。[41] 而這五人的身份，靜觀在其後第二號的〈告新文化運動的同志〉中隱諱地提及：

> 我現在是一個女學校裏的教員……在愛國運動罷課（指六五運動 —— 筆者注）的時候，我們五個同志就組織了一個「新婦女雜誌社」……我再說四位先生，是什麼樣一等人？一個是十年前復旦公學的第二屆畢業生，一個是五年前北大學校裏的學生，還有二個都是五年前省立第二師範學校的學生，和我共五個人，都是從前的學生，一出了學校，就擔任女子教育的，並且恰巧在一個學校裏當教員。[42]

顯然，《新婦女》的創辦者是在同一所女校共事的五位老師，只因「恐怕有舊勢力來打擊，情願我們五個人負完全責任，很不願學校受什麼關係」。[43] 雜誌從頭至尾都沒有點出這所女校的名字，但從雜誌中刊行的廣告等，我們不難得出，這所學校正是近代上海著名的女校 —— 務本女校。[44]

40 劉人鋒，《中國婦女報刊史研究》，頁 180。

41 陸秋心，〈梅花萬歲〉，《新婦女》，卷 1 號 1（1920 年 1 月 1 日），頁 2。

42 靜觀，〈告新文化運動的同志〉，《新婦女》，卷 1 號 2，頁 32。

43 靜觀，〈告新文化運動的同志〉，《新婦女》，卷 1 號 2，頁 32。

44 《新婦女》第一卷第二號刊登了「上海西門靜遠裏及務本女校」發行的《新芬》雜誌的目錄。從《新芬》雜誌第一期可知，陸秋心特意為其作了賀辭。〔陸秋心，〈祝新芬〉，《新芬》，期 1（1920 年 1 月 1 日）。〕而「新芬社社員」中就有日後為《新婦女》撰稿的顧燚、傑人、芳蓀、狄綺君、嚴棣、錢劍秋、慧奇、倪茜雲、淵若等。另一方面，《新婦女》第三卷第三號開始刊登務本女校高小科學生出版的《自修紀念冊》廣告。從內容來看，該社邀請年級主任吳拯寰作為指導，紀念冊最後有署名「曙梅」、「拯圜」的人創作的劇本。這裡的「曙梅」、「拯圜」都是《新婦女》雜誌的撰稿人，而女學生中也有後來為《新婦女》撰文的淩其嫣等。〔上海西門外自修社編輯部，《自修紀念冊》（上海：有正書局，1920）。〕最後，《上海

表一：務本女校 1920 年在職教員名錄

姓　名	字	籍　貫	通　訊　處
張杏娟	懷之	南　匯	上海城內城隍廟西街
王蘊功	涵青	上　海	城內西倉橫路四四號
任光濟	澍南	宜　興	上海城內學宮路榮榮里
沈　均	平如	上　海	新北門畫錦牌樓一八號
周福保	雲階	上　海	城內太卿坊一一二號
賈豐臻	季英	上　海	城內喬家柵三五號
陸曾沂	冠春	海　門	上海西門外方斜路一八八號
顧　型	紹衣	無　錫	無錫城內虹橋下學前街一號
丁傳商	守吾	南　匯	南匯西門內
許雲琦	杏芬	無　錫	無錫小河上對岸
張　晶	湘湄	廣東番禺	上海法租界霞飛路仁和里一六七號
華　瑾	度珊	無　錫	上海閘北寶山路會館路大椿東里七號
周宗武	德威	吳　縣	上海新閘大通路新康里一二九號
曾式群		上　海	城內蓬萊路歸詠坊二號
湯振常	濟滄	浙江吳興	上海西門外西林庵路德善里
嚴　庸	景先	浙江吳興	上海法租界愛多亞路西也是廬
沈　仁	亮欽	上　海	尚文門內尚文路一三六號
張　霖	雨才	松　江	松江西門外荷葉埭十號
李　澄	靜瀾	江西臨川	上海大東門內小陸家宅弄一一號
吳祖耀	拯寰	嘉　定	嘉定東坡橋西
郭祖根	召棠	青　浦	青浦西門內
張承綬	翰蓀	上　海	西門內肇浜路二三四號
姚鴻淵	健安	常　熟	常熟迎春門外永仁巷六一一號
黃樹聲	忍庵	上　海	浦東洋涇鎮東市三二四號
董承雲		浙江桐鄉	上海城內喬家浜四號
沈承瑾	柏暘	浙江桐鄉	上海山海關路濟美里
劉良璧	蘊之	南　匯	浦東鶴沙鎮
李希昭	韻日	嘉　定	南翔鎮西市董家橋北堍
葛興閏		上　海	尚文門內尚文路一七三號
陳　一	心石	浙江吳興	上海西門外安瀾路二號
嚴　筠	達徵	吳　縣	上海愛而近路同發里八十號

資料來源：上海縣立務本女子中學校編，《上海縣立務本女子中學校第二屆畢業紀念錄》（1920 年 7 月），雜俎三一至三三。

縣立務本女子中學校第二屆畢業紀念錄》中也有《新婦女》的廣告。由此可以判斷，《新婦女》雜誌的五位發起人正是務本女校的教師。

在近代西學東漸的背景下，上海因其得天獨厚的優勢引領近代化的潮流。繼 1898 年的經正女學之後，愛國女校和務本女塾相繼於 1902 年誕生。和愛國女校創立之初濃郁的革命色彩不同，務本女塾堅持以「女子教育」爲本。在創辦人吳馨等的努力經營下，到 20 世紀 1920 年代，務本女校已經發展爲規模較大、制度完備、校風嚴謹的著名女校。[45] 在《上海縣立務本女子中學校第二屆畢業紀念錄》中，我們找到了 1920 年在職的教員名單。我們將《新婦女》的作者名單和其對應，就能揭開這五位創刊人的「廬山眞面目」。

從《新婦女》撰稿人名單來看，在第一卷時就已出現且其後出現頻率較高的有陸秋心、（郭）妙然、（吳）拯圜、（周）庸覺和（湯）濟滄。加之靜觀在文章裡指出，包括自己在內的五名教師構成了《新婦女》雜誌社的創刊人，靜觀自然應在五人之列。

從文章內容和事務聯繫等細節來看，《新婦女》的編輯核心是陸秋心。陸秋心(1884-1927)，名曾沂，字冠春，號秋心，江蘇海門人，曾參加蔡元培等組織的「愛國學社」。愛國學社於蘇報案後關閉，陸便進入復旦公學學習。其間創作發表過一些小說，逐漸在文壇嶄露頭角。復旦公學畢業後，陸受于右任邀請進入《民呼報》，其後相繼在《民吁報》、《民立報》、《生活報》等主持筆政。陸秋心以小說《葡萄劫》稱譽於世，這是一部長篇翻譯小說，最初配合革命宣傳發表，很受讀者歡迎，後由上海民權出版社刊印單行本。陸秋心精通外語，譯筆傳神，文字流暢通順，情節引人入勝。鄭逸梅在《小說叢話》中提到：「海門陸秋心所譯之《葡萄劫》，書中敘希臘志士，英雄兒女，鐵馬金戈，直使讀者有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樂。斯文曾載之民立報第一篇小說欄，綿亙三年之久，都二十萬言，譯筆曲雅，頗爲士林推重。」[46] 于右任稱「辛

45 有關務本女校的研究可參見姚霏，《空間、角色與權力 ── 女性與上海城市空間研究(1843-1911)》（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四章第一節以及趙玉成，〈女學乃教育之基本 ── 開創中國女學的務本女塾時代〉，《上海教育》，期 2(2012)，頁 49-51。

46 淩君鈺，〈南社文士、近代作家 ── 陸秋心事略〉，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海門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海門縣文史資料》，輯 10（內部資料，1991），頁 67-68。

亥以前，能以小說宣傳主義，爲革命之助者，陸秋心其一也。」[47] 除了譯作外，陸秋心還有短篇文言小說集《秋心說集》、《墨詔疑雲錄》、《雙淚碑》、《雙冑絲》等出版和發表。在《民立報》期間，陸秋心還開創集錦小說這一新小說形式，其詩章吟詠也頗有造詣。[48] 與此同時，陸秋心還在復旦大學及其中學部、務本女校、南洋中學、城東女校任教。[49] 1927 年，陸秋心因病去世，享年 44 歲，可謂天不假年。

說到詩歌造詣，《新婦女》的 67 篇詩歌中，有 30 篇出自拯圜之手。與教職員名單對照來看，（吳）拯圜幾乎是用眞名來發表詩歌，其眞實身份一目了然。吳祖耀 (1896-1984)，字拯寰，號拯廬，江蘇嘉定人。1915 年畢業於江蘇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是年起至 1925 年出任上海縣立務本女子中學教師。1920-1922 年兼任上海私立神州女學和上海私立專科師範學校教師。1925 年轉入出版界，長期擔任上海三民圖書公司經理兼總編輯，主編出版《孫中山全集》、《孫中山續集》、《孫中山軼事集》、《孫中山評論集》、《孫逸仙傳記》（譯文）、《廖仲愷全集》等，還主持出版外國文藝、數學、醫學、音樂、體育等方面的著作 20 多種。新舊體詩歌創作是吳拯寰的強項，一生創作萬首以上的詩詞。此外，他與妻子秦世華（著名作家秦瘦鷗的胞姐）是嘉定縣歷史上第一對新法結婚者，勇開地方風氣之先。1956 年，吳拯寰受聘爲上海市文史館館員，並加入民主黨派 ──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84 年 2 月 6 日病逝，終年 88 歲。[50]

---

47 于右任，〈陸秋心先生墓誌銘〉，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海門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海門縣文史資料》，輯 10（內部資料，1991），頁 72。

48 淩君鈺，〈南社文士、近代作家 ── 陸秋心事略〉，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海門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海門縣文史資料》，輯 10，頁 69-70。

49 淩君鈺，〈南社文士、近代作家 ── 陸秋心事略〉，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海門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海門縣文史資料》，輯 10，頁 67；于右任，〈陸秋心先生墓誌銘〉，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海門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海門縣文史資料》，輯 10， 頁 72；〈通信〉，《新婦女》，卷 1 號 2（1920 年 1 月 15 日），頁 35-36。

50 姚旭參，〈吳拯寰傳略〉，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議上海市嘉定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嘉定文史資料》（內部資料，1994），輯 9，頁 79-81。

湯濟滄，原名湯振常，浙江吳興人，清末附生。南洋公學建立之初即擔任國文、法制教員，[51] 撰寫了中國最早的修辭學著作《修詞學教科書》（開明書店，1905 年），編有《國文教科文典》（中國圖書公司，1910 年）等。辛亥革命期間，湯濟滄還擔任滬軍都督府司令部秘書科科長。[52] 可見其不僅是教育界、文學界的前輩，在政治參與方面也資格甚老。湯濟滄雖爲務本女校的教師。但《新婦女》第一卷第二、三號濟蒼的文章，標注有「社外來稿」，可見湯濟滄不是發起雜誌的五人之一。但爲何不是發起人的湯濟滄，其文章卻頻頻出現在《新婦女》中且備受推崇？這顯然與湯本人的社會威望和學界地位有關。

當然，我們還要想辦法確認「靜觀」的身份。在〈可憐工人家的女兒〉中靜觀提到：「我的家裏在南匯」。[53] 從教職員的籍貫和通訊處來看，有張杏娟、丁傳商和劉良璧三人或爲南匯籍，或家在南匯。三人中，張杏娟是務本女校校長。若她是靜觀，則牽連女校的情況勢難避免，顯然有違雜誌不願牽涉學校的初衷，因此首先排除；而翻看《上海縣立務本女子中學校二十五周年紀念冊》教師照片，劉良璧同樣是一名女教員，與四名男教員共同發起雜誌的可能性不大。於是，丁傳商是靜觀的「嫌疑」最大。事實上，我們確實能在 1914、1915 年的《學生雜誌》上找到多篇丁傳商發表的文章。[54] 刊登在 1915 年第二卷第七號《學生雜誌》上的〈浦南二日記〉，作者署名丁傳商，是「江蘇第二師範學校四年生」。1916 年後的《學生》雜誌上再未出現丁傳商的文章，想必其離開省立第二師範的時間在 1915 年。靜觀在〈告新文化運動的同志〉中提到「二個

51 朱有瓛，《中國近代學制史料》（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輯 1（下冊），頁 617。

52 〈滬軍都督府各部職員表〉，《申報》，1911 年 11 月 19 日，版 1 張 2。

53 靜觀，〈可憐工人家的女兒〉，《新婦女》，卷 1 號 6（1920 年 3 月 15 日），頁 43。

54 如〈旅行普陀山記〉（第一卷第一號）、〈我國外交自前清道鹹以來無往而非失敗推厥原有首在江寧條約次則天津條約試略述其梗概〉（第一卷第三號）、〈贈青溪姚襄陶〉（第一卷第四號）、〈寒假兩周記〉（第二卷第四號）、〈浦南二日記〉（第二卷第七號）、〈南通遊記（未完）〉（第二卷第九號）、〈南通遊記（續）〉（第二卷第十號）。

都是五年前省立第二師範學校的學生」。[55] 當年的同學，又一個今日的同事，倒也合情合理。

留給我們最後的謎題是周庸覺、郭妙然的身份。周庸覺會是周福保還是周宗武？而學校「現任職員名單」中的郭祖根是否就是郭妙然？從熱衷翻譯介紹外國書刊的特點來看，庸覺應具有較高的英文素養。從《上海縣立務本女子中學校二十五周年紀念冊》的「現任教職員姓氏錄」中，我們找到了周福保的資訊。他的職務是「高中二年級主任兼英文算數科教員」，[56] 加之他字「雲階」，上海方言中和「庸覺」十分接近。周福保就是周庸覺的可能性較大。同時，在 1914 年 8 月《政府公報》收錄的〈北京大學佈告〉上，我們找到了北大在滬招生的名單，其中「理科一名」，正是周福保。[57] 聯繫到靜觀曾提及，五人中有五年前北大的在讀學生。庸覺的身份就此確認。同樣，多從批判傳統、提倡修身角度出發撰文的妙然，與郭祖根擔任「公民國文史地科教員」[58] 的身份也較相符。可惜我們無法找到更多的證據來證明。

從上述雜誌編輯的身份和經歷可知，《新婦女》的編輯們多接受新式教育，又長期從事新式教育，思想開明、與時俱進，是致力於社會改革甚至有著革命意識的新式知識份子。和《新青年》等備受關注的五四期刊不同，《新婦女》的編輯群並非當時的思想大家，有的甚至沒能在歷史長河中留下太多印記。但正是這種普通知識份子構成的編輯群，證實了新文化運動在五四時期中國社會所引發的廣泛效應。另一方面，從現有資料來看，《新婦女》的編輯們除了在女校任教和課餘閱讀之外，並無婦女解放的實踐和理論積累，《新婦女》上的文章被指老生常談、缺乏新意也就可以理解了。不過，他們在新文學領域的旨趣，使得《新婦女》中的新詩、小說和劇本發揮了「啓蒙」和「動員」效果。

55 靜觀，〈告新文化運動的同志〉，《新婦女》，卷 1 號 2，頁 32。
56 務本女子中學校出版部，《上海縣立務本女子中學校二十五周年紀念冊》（上海：著易堂印刷所，1926），教職員一覽，頁 4。
57 王學珍、郭建榮，《北京大學史料(1912-193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卷 2（上），頁 532。
58 務本女子中學校出版部，《上海縣立務本女子中學校二十五周年紀念冊》，頁 4。

《新婦女》雜誌，除第二卷第二號外，幾乎每一號都有詩歌。在〈浜邊所見〉（第一卷第二號）、〈賣豆嫗〉（第一卷第三號）和〈早上〉（第二卷第三號）中，無論是田間的農婦、工廠的女工還是走街串巷的賣豆老嫗、賣花姑娘，無不被生活折磨得疲憊不堪。最令人動容的是一個十來歲的女童工形象。周庸覺將內容和形式結合到幾近完美，寫下令人潸然淚下的女童工的一生。[59] 這些詩歌用細膩而富有詩意的筆觸爲我們勾勒出一幅幅下層婦女無辜、無助卻又別無出路的苦難境遇。社會等級的差異、男女權利的不平等，通過日常生活的片斷觸動著詩人的神經，而《新婦女》編輯對下層民眾深沉的關懷也在字裏行間流露出來。除了對生命的終極關懷，《新婦女》中的一些詩歌，或通過浪漫主義的表現手法，或通過擬人、比喻等修辭手法，表達對社會民主、婦女解放的呼籲，如拯圜的〈燈塔〉、〈前途？〉、〈一半〉，樂觀的〈光明〉、〈屋中人〉，璧神的〈小鳥〉、邵寶鳳的〈雷一電〉、有琳的〈鐘聲〉等等。「家庭！家庭！／潮流激蕩，趨向光明，／你爲什麼還做舊勢力的奴隸——昏昏不醒？／我要打破你的黑暗，／那怕你壓力愈重，／我奮鬥的精神，總是綿綿無盡！」[60] 這首〈家庭？〉則乾脆直抒胸臆，大聲喊出對女子境遇和社會黑暗的不滿和反抗。

近代中國，小說和劇本兩種文學形式逐漸被賦予揭露社會問題、啓發民眾智識的功能。《新婦女》中的小說和劇本涉及男女同校、虐婢、勞工、媒妁、娶妾、後母、家教、遺產制度等問題，其核心內容則反映貧苦民眾的艱辛生活、抨擊陳舊的家庭制度、呼籲女性覺醒對抗舊式婚姻。《新婦女》中有多篇小說、劇本是反映包辦婚姻之苦，如〈誰害我！〉（第三卷第二號）、〈生死關頭〉（第三卷第五號）、〈死〉（第三卷第六號）講述女青年對包辦婚姻或逆來順受、或抵死抗爭，卻都無法逃脫禮教的束縛，最終在包辦婚姻的恐懼下憂慮而死。一些小說劇本表達了對自由戀愛的渴望、憧憬乃至實踐。作爲小說〈死〉的姊妹篇，〈活〉

59 周庸覺，〈死在機器下面的一個女工〉，《新婦女》，卷 5 號 1（1921 年 5 月 1 日），頁 21-22。

60 錢劍秋，〈家庭？〉，《新婦女》，卷 3 號 1（1920 年 7 月 1 日），頁 16。

（第三卷第六號）隱諱地講述男學生悔婚，未婚妻從最初的想不通，到後來覺悟的故事。〈春風〉（第二卷第四號）講述一對兄妹立志要背離母親的意願，將各自的自由戀愛進行到底。〈榴花世界〉（第三卷第一號）則描寫一對戀人通過與舊家庭的抗爭，獲得讀書和自由戀愛的權利。《新婦女》中的一些女性作者還受到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胡適的〈終生大事〉的影響，塑造了一批「離家出走」的「中國式的娜拉」形象。這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也具有先鋒意義。

五四時期，文學革命的綱領性文章大都極力宣導文學要表現婦女問題。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認為：「今日新文明相接觸，一切家庭慘變，婚姻痛苦，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適宜……都可供文學的材料。」[61]《新婦女》雜誌以大量新詩、小說、劇本為載體，揭露女性生存狀態之苦，呼喚女性的自由自決。這與雜誌編輯群受新文化思想啓蒙而形成的「五四意識」有關，也與其新文學素養密不可分。這些作品在內容和形式上實踐著雙重革命性，具有很強的感染力，成為《新婦女》雜誌的一大亮點。

四、女性知識精英話語的「大方」與「尷尬」

最初的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具有明顯的男性啓蒙特質。在婦女報刊方面，自辛亥到五四時期不少特色鮮明、影響較大的婦女報刊，其編輯和主要撰稿人多由男性充當。[62] 到了五四時期，越來越多的女性團體，特別是女校師生自發組成的團體開始出版婦女報刊。[63] 在上文提到的《婦

61 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新青年》，卷 4 號 4（1918 年 4 月 15 日），頁 301。

62 如《女子世界》、《婦女時報》、《婦女雜誌》等。另有一些婦女報刊的女性作者往往為男性假託或代筆，這一現象在近代婦女報刊出現之初尤為普遍。

63 如《江蘇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校友會雜誌》、《女高師文藝會刊》、《女高師半月刊》、杭州中華婦女學社的《婦女旬刊》、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青年女報》、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和直隸省立女師的《醒世週刊》、廣東省立女師的《省女師學生期刊》、周南女校的《女界鐘》、湖南第一女子師範的《勵進會旬刊》、上海女界聯合會的《女居聯合會旬刊》、浙江省立女師的《進修團月刊》、開封女子同志

女雜誌》批評《新婦女》的文章裡，作者就將《新婦女》的編輯誤認為女性。[64] 靜觀也提到，有人因為《新婦女》的編輯為男性而大罵《新婦女》是冒充的婦女報刊。[65] 可見，「女性的聲音」成為五四婦女報刊的重要元素。《新婦女》雖然是由五名男教師組成的編輯群，但其撰稿人中卻不乏女學生。[66] 她們用論說、詩歌、小說、劇本的形式，表達了對社會問題、婦女問題的關注和對「新婦女」形象的認同。而通過《新婦女》中兩性話語比較，我們也能清晰地看到女性知識精英在婦女解放和社會改造話語權上的尷尬處境。

凌均逸是上海學生聯合總會務本女中分會的成員，也是《新婦女》的踴躍投稿者，先後在《新婦女》上發表了 6 篇論說文和 2 篇小說劇本。她的文章很好地展現五四時期女校學生對於教育、職業、婚姻等切身問題的態度。凌均逸曾親眼目睹一個舊式家長反對女學生參與公共事務。在〈對於舊家庭反對女子解放的感想〉中，她指出服務社會、參與國事，是盡國民一份子的義務，是完全女子自己爭回自己的人格，舊家庭不應如此壓制。同時告誡舊家庭，「壓制手段愈重，反抗力必定愈強！」[67] 在〈父母是愛我，還是害我？〉中，凌均逸講述了小學同窗因父母之愛 ──「我們的一定不許你讀書，也因為愛你起見」── 放棄學業，從父母之命嫁

會的《女權》、湖群女校的《吳興女學界》、真光中學女青年會的《真光青年》等。參見劉人鋒，《中國婦女報刊史研究》，頁 202-204。

64 佩韋，〈評《新婦女》〉，《婦女雜誌》，卷 6 號 2，頁 6。

65 靜觀，〈告新文化運動的同志〉，《新婦女》，卷 1 號 2，頁 33。

66 在《新婦女》中，女學生身份的作者不勝枚舉。如顧煐、傑人、嚴慧貞、芳蓀、狄綺君、嚴棣、錢劍秋、慧奇、倪茜雲、淵若等都是務本女校的學生。從《上海縣立務本女子中學校二十五周年紀念冊》「畢業學生一覽」可知，她們不僅是「新芬社」的社員，還是辛酉年（1921）中學科第五屆畢業的同一屆同學。除此之外，淩其嫣是 1920 年高等小學科第十二屆畢業生。（參見「學生一覽」）她的詩歌〈雞〉先是刊登在 1920 年 7 月出版的《自修紀念冊》上，後又被轉載在《新婦女》上。楊茂芬、沙學聰是省立第二女師的學生。（參見第二卷第一號〈可憐的吳媽〉）陳應賢是省立第一女師的學生。（參見第四卷第二號〈船中雜談〉）可見，至遲到第二卷第一號，即 1920 年 4 月初，《新婦女》雜誌已經可在江蘇省主要女學堂中讀到。

67 淩均逸，〈對於舊家庭反對女子解放的感想〉，《新婦女》，卷 1 號 4（1920 年 2 月 15 日），頁 17-19。

人，結果遇人不淑的故事。淩借這則故事勸說爲人父母者「愛女兒總要把目的弄得清楚！金錢主義啊，要總從根本上著想，切弗把好端端的女兒，送到那黑暗地獄裏！」[68] 在〈大家快奮鬥啊！〉中，淩均逸列舉了當時女子們要受到的痛苦黑暗，包括家庭壓制的求學問題和婚姻問題、自己沉淪的迷信問題和奢侈問題。[69] 在提出問題的同時，淩均逸也試圖解決問題。在〈這兩個問題要請覺悟的女子自決〉中，提出男女平等的基礎是接受平等的教育，女子接受教育的前提是反對早婚和打破妝奩，並提議女子與父母簽訂合同，把嫁妝的錢預支出來讀書。[70] 在〈女子解放的第二步〉中，則認爲男校兼收女生、女校廢棄家事課是教育平等的起點。但教育平等只是女子解放的第一步，第二步是要發起女子參與職業、地方上要多開職業學校，使女子獲得經濟獨立。[71]

除了切身經歷，女學生寫作論說文的契機往往源於讀報。陸秋心在〈痛哭〉中提到，有一班女學生聽從他的話，訂閱《星期評論》。[72] 隨著《星期評論》的終止發行，第三卷之後，《民國日報・覺悟》取代了《新青年》和《星期評論》，成爲與《新婦女》關係密切的報刊。[73]

---

68 淩均逸，〈父母是愛我，還是害我？〉，《新婦女》，卷 1 號 6（1920 年 3 月 15 日），頁 17-19。

69 淩均逸，〈大家快奮鬥啊！〉，《新婦女》，卷 3 號 1（1920 年 7 月 1 日），頁 7-11。

70 淩均逸，〈這兩個問題要請覺悟的女子自決〉，《新婦女》，卷 2 號 4（1920 年 5 月 15 日），頁 21-24。

71 淩均逸，〈女子解放的第二步〉，《新婦女》，卷 2 號 1（1920 年 4 月 1 日），頁 9-11。

72 陸秋心，〈痛哭〉，《新婦女》，卷 3 號 1（1920 年 7 月 1 日），頁 14。

73 《新婦女》第四卷第二號的特載〈用字新例〉中，望道、楚傖、力子、漢俊、秋心、丏尊、玄廬、佷工、大白、三昧、妙然、靜觀、庸覺、申初、拯圜、濟蒼先後署名遵守用字新例。1919 年 6 月，沈玄廬與李漢俊、戴季陶在上海創辦了《星期評論》。《星期評論》社有邵力子、陳望道、劉大白、俞秀松、丁寶林等人。而葉楚傖、邵力子、李漢俊、夏丏尊、沈玄廬、孫佷工、劉大白、馮三昧皆為這一時期《民國日報・覺悟》的編撰人。從這一聯合署名可見，《新婦女》同人與《民國日報・覺悟》和原《星期評論》同人有所接觸。在這個名單中，《新婦女》同人中唯獨陸秋心一人排名靠前。究其原因，陸秋心早年參與「三民報」──《民呼》、《民吁》、《民立》的編輯，後又在《民國日報》上發表小說。〔參見〈通信〉，《新婦女》，卷 1 號 2（1920 年 1 月 15 日）。〕《新婦女》與《民國日報》的交集很可能源於陸秋心的私人關係。鑒於陸秋心是《新婦女》雜誌的核心人物，第四卷第三號、第四

1920 年 10 月 13 日的《民國日報・覺悟》刊登了一則關於杭州私立女子職業學校的新聞。新聞講述該校新聘主任穆墨齋連同女校長、女學生一同毆打妻子陳競男。[74] 女學生倪茜雲在看了這則報導後，寫下〈陳競男底痛〉，將陳競男的悲劇歸結爲沒有學問和經濟不獨立，因爲「有了學問，定參透這名義的情義決不可以融化情敵的；有了經濟獨立，不必求助於夫，那麼他們雙方早已解決；哪能忍受這日常的假惺惺呢？」[75] 倪茜雲因此疾呼：「陳競男呀！快快覺悟啊！全國女同胞呀！望拿陳競男做前車之鑒，個個起來打破舊禮教，求經濟獨立，那麼當然再沒有第二個陳競男底事發現，再沒有受感陳競男同樣痛苦的了。」[76] 11 月 18 日、11 月 24 日、12 月 1 日的《民國日報・覺悟》上，刊登了南高師四君聯合署名的文章〈救濟舊式婚姻問題〉。四人主張通過「重婚」的方式救濟舊式婚姻，救濟一般受痛苦不能如意的人。對此，《民國日報》的邵力子、陳望道等人分別表達反對意見。倪茜雲在看了原文和邵、陳等人的評論後，強烈反對重婚的建議。針對南高師某君提出的推崇「重婚」理由 ── 「愛情沒有寄託恐怕要做出不道德的事」，倪茜雲認爲：

> 人底各種性情，均可以自主，為甚麼愛情就不能自主呢？吾以為強毅者，一定能夠自主，所以愛情有了寄託的地方，便用了全神去愛，若沒有地方寄託，也不以為意的。一般浮囂者，愛情不能自主，所以雖有多妻，仍舊要做不道德的舉動出來，他們僅僅飽暖思淫，豈講什麼神聖的戀愛。所以吾說重婚不能救止不道德的事發生，也不能算戀愛神聖，只可謂不能自主的性欲罷了。那重婚自然沒有存在的價值！[77]

號的《新婦女》有著明顯的《民國日報・覺悟》色彩 ── 第四卷第三、四號刊登了陳望道的〈我想〉，轉載了《民國日報・覺悟》刊登的〈死在社會面前的一個女子趙瑛〉（玄廬）、〈文藝上各種主義〉（望道譯）、〈俄國底美術與教育〉（勃拉克女士演講）、〈男女同校〉（杜威夫人演講）等文章，還有陳德徵和倪茜雲在閱讀了《民國日報・覺悟》新聞後寫下的〈袁舜英底死〉和〈陳競男底痛〉兩文。

74 〈杭州女職校底一件奇事〉，《民國日報・覺悟》，1920 年 10 月 13 日，版 3-4。

75 倪茜雲，〈陳競男底痛〉，《新婦女》，卷 4 號 3（1920 年 11 月 1 日），頁 14。

76 倪茜雲，〈陳競男底痛〉，《新婦女》，卷 4 號 3，頁 14。

77 倪茜雲，〈竟要提倡重婚嗎？〉，《新婦女》，卷 4 號 5（1920 年 12 月 1 日），

淵若是務本女校「新芬社」的成員，受美國女性獲得投票權消息的刺激，寫下了〈女子參政底我見〉。她指出：「美國的女子，爲什麼能不依傍，不被動，自然的前進；而進的程度反比別國快呢？伊們有捷徑指導我們了，便是投票權。」隨即表達了不惜採用強硬手段實現女子參政的態度：

> 強權是壓制公理的，而強力是爭回公理的……現在的女子，在被動式的、欺騙式的口頭解放底下，黑暗依然，強權壓制依然，那樣不設法，還待何時？我現在要借已受過教育的女子底手，一面禦男權，爭回固有的地位；一面提高女子的教育，還積極的使彼普遍；且要自動的，直接的，也不稍喬裝了借強權來敵強權的；一切的制度，強權的，不平的制度，可以自動式的用強力推翻的，而且是便捷的；即莫如參政了。……墨和筆固然是最要，但不有刀和血，俄國的布林塞維克也不能出現，革命也終於不能成。[78]

這一時期，女學生由於自身閱歷的關係，最關注的是教育和婚姻問題。1918 年第四卷第六號的《新青年》刊登羅家倫和胡適翻譯的〈娜拉〉。之後，胡適仿照〈娜拉〉創作〈終生大事〉，刊登在 1919 年第六卷第三號的《新青年》上。〈終生大事〉描寫青年人愛情的挫折、自我與父輩的衝突、覺醒的個性意識和封建宗法思想的衝擋，以「離家出走」作爲最終歸宿。受到這一劇本的影響，不少女學生開始在小說和劇本中塑造「中國式的娜拉」形象。僅以《新婦女》爲例，女學生嚴棣、錢劍秋、嚴慧貞等就塑造了多個「娜拉」式的女學生形象。如劇本〈新舊家庭〉（第四卷第六號）講述一個開明新式家庭的女兒離家求學、留學，最終致力於女子解放事業；一個保守舊式家庭的女兒卻因惡媒陷入封建婚姻，不幸病死。〈自決！〉（第二卷第六號）中，女主人公反抗舊式包辦婚姻，離家出走到北京參加工讀互助團；女主人公的妹妹聽從安排進入舊式婚姻，最終不堪忍受婆婆和丈夫的虐待而死；同樣進入舊式婚姻

頁 12。

78 淵若，〈女子參政底我見〉，《新婦女》，卷 4 號 4（1920 年 11 月 15 日），頁 16-17。

的表妹最終離開了家庭、自謀生路。〈軟化嗎？〉（第三卷第四號）同樣講述女子反抗包辦婚姻而離家出走，後出洋留學。〈一個養媳婦〉（第四卷第四號）則更具傳奇色彩，講述一個養媳婦出生的女子奮發圖強變成女學生，進而成爲女留學生，最終回國自謀職業、獨立生活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女學生筆下的「娜拉們」，儘管其離家出走的原因多爲脫離父母包辦的婚姻，但她們離家出走後的出路是繼續深造、出國留學，甚至關注到當時出現的新生事物 ── 「工讀互助」，幾乎沒有一個女子是以自由結婚爲結局，這與胡適〈終身大事〉中的情形很不相同。究其原因，這些出身較好、家教甚嚴的女學生們對「新婦女」身份的認同多停留在思想層面，還不能接受自由結婚的實踐。更重要的是，當時社會上出現了一些打著「自由戀愛」、「自由結婚」名義的「浮蕩少年」危害覺悟不高的女學生。一些保守勢力利用自由戀愛、自由結婚暴露出的弊端，否定新文化運動的初衷。《新婦女》的編輯和男性撰稿人也一改無條件支持自由戀愛、自由結婚的姿態，轉而提出有條件的自由結婚。[79] 於是，女學生也表達她們反對自由戀愛、自由結婚的態度。如顧焱在〈解放初期底雜感〉中感慨：「幼稚時代的女子，沒受過充分的教育，沒遇著社會的交際，怎能有鑒別的能力和自決的精神？所以未免現出柔弱苟就的態度，便受人的愚弄，仍舊出於卑下之列。」因此，「凡是求學時代的青年，不要拿婚姻問題像吸鐵石似的，緊貼在腦裏頭」，還是「灌輸些滋養料 ── 學問，使他蓬蓬勃勃的長大起來，培養些充分的實力，然後不愧立於先覺的地位」。婚姻固然是人類的重要問題，但「必定等到經濟獨立，能夠共同擔負，才能結合，然後能享著眞快樂。」[80] 而在〈棒喝〉中，嚴棣也講述一對男女學生爭取婚姻自由時的種種不如意，提醒青年學生「求學時代不應該有婚姻問題發生！沒有自立的人不可以

79 湯宗威，〈「自由結婚」的我見〉，《新婦女》，卷 2 號 6（1920 年 6 月 15 日），頁 7-8；陸秋心，〈自由之母〉、〈戀愛之敵〉，《新婦女》，卷 3 號 2（1920 年 7 月 15 日），頁 37-38。

80 顧焱，〈解放初期底雜感〉，《新婦女》，卷 3 號 6（1920 年 9 月 15 日），頁 5-8。

講什麼婚姻和愛情！」[81] 應該說，無論是從傳統家教和自身修養出發，還是實際生活中看到的負面現象，五四時期的女學生們對於自由戀愛、自由結婚的觀念和實踐始終心存顧慮。但這種顧慮的表達，恰恰在男性知識精英轉變姿態之後，令我們看到近代婦女解放運動對男性知識精英話語的亦步亦趨。

誠然，女學生在對社會問題、婦女問題的關注過程中，逐漸形成對「新婦女」形象的認同。這種身份認同受到男性知識精英話語的啓蒙和引導，與男性知識精英的理想保持一致。有時也不免從女性實際經驗出發進行調整，但這種調整最終仍被歸入到男性知識精英主導的話語中。從五四知識精英對「女學生之死」問題的解讀和言說中，我們可以進一步看到女性知識精英在婦女問題話語權上的尷尬處境。

五四時期，女學生作爲新社會群體的代表和新女性的主體，往往受到社會各方面的關注。但處於過渡時期的女學生，自身仍然承受著由新舊社會矛盾衝突所帶來的巨大壓力。她們中的一些人爲爭取受教育權、爲反抗包辦婚姻，不斷與傳統家庭奮力抗爭，付出了年輕而寶貴的生命；另一些人，因不堪忍受身心兩方面的痛苦而香消玉殞。這些悲劇，往往成爲媒體關注的新聞事件而進入大眾的視線。《新婦女》的詩歌、文章中，也涉及「女學生之死」的話題。

1920 年 9 月 18 日晚，上海城東女學校學生趙瑛在家中跳樓，後經上海醫院搶救無效，10 月 12 日去世，終年 21 歲。11 月 7 日，城東女學校爲其召開了追悼會；沈玄廬乘機收集趙瑛生平和去世前的文字，按〈李超傳〉[82] 的模式整理出趙瑛之死的來龍去脈，發表於 11 月 15 日的《民

---

81 嚴棣，〈棒喝〉，《新婦女》，卷 3 號 2（1920 年 7 月 15 日），頁 13-16。

82 李超原名惟柏，又名惟壁，號璞真，廣西梧州金紫莊人。早年父母雙亡，只有兩個姐姐。因為父母膝下無子，故承繼了胞叔渠廷的兒子，名惟琛，號極甫。李超少時隨父親的妾附姐長大。民國初年，先進入梧州女子師範學校肄習，後又到廣州求學，先後就讀於公立女子師範、結方學堂、聖神學堂、公益女子學堂。在此期間，其兄惟琛為了獨佔財產，極力阻撓她求學，並逼其出嫁。1918 年，她在姐夫歐壽松等人的資助下北上，進入北京高等女子師範，初為旁聽生，後改為正科生。後來歐壽松等人在經濟上也出現問題，不得不停止對她的資助。李超因此遇到了嚴重的經濟困難，加之患了肺病。1919 年 8 月 16 日，貧病交加的李超死於法國醫院，終年 24

國日報・覺悟》。在〈死在社會面前的一個女子趙瑛〉中，沈玄廬列舉李超、趙五貞、袁舜英的例子，然後轉到趙瑛之死。沈玄廬認爲李超、趙五貞、袁舜英的死都有一個明確的對立面，如哥嫂、父母、夫。趙瑛的死，宗教、家庭、師友、浮蕩少年等種種力量「卻是盡都犯了罪了」，「如此種種，都是發生在因襲的社會制度裡面，所以我說趙瑛死在社會前面。」[83] 玄廬之所以將罪惡的根源歸結爲「社會」，出於他對社會主義理論的認同和對社會改造的熱忱。在文章中，玄廬指出：

> 有人說：「趙瑛總是意志薄弱的緣故，如果拼著一死，為什麼不和這種萬惡社會奮鬥一場，殺開一條血路，也可以使後來的從血跡上踏過去。」這番話不是沒理由，但看現實社會，哪里有一個青年女子不依不傍的立腳地。全社會底空氣，被男子「盜領」盡了，男子之中，又被資本階級「盜領」盡了。馬克斯說：「人與人中間，除了明目張膽的自利，刻薄寡情的現金主義，再也找不出什麼別的人際關係。宗教（指耶穌教犧牲自己說）的熱忱；義俠的血性；女兒的真情；早已在厲害計較的冰水中淹死了。」（共產黨宣言六頁）
>
> 除卻人類從確實地創造之外，沒有別的「極樂世界」。自然只是受人支配的，人間底苦痛，是人給人受的，是憑藉因襲的社會制度殺人的；人類要在人世間建築起「極樂世界」來，首先第一步就是要認識這世界中間的痛苦，都從「盜領」兩個字發生出來。你們且不忙談「愛情」，你們且不必說「幸福」，不踏過這「橫領」底鐵蒺藜佈滿的障礙。什麼也說不上來。[84]

歲（一說 20 歲）。李超死後，同學同鄉將其與家中書信整理交給了胡適。胡適為其撰寫了〈李超傳〉，將一個普通女子的死與男女教育不平等、封建包辦婚姻、落後的「傳男不傳女」的遺產制度等聯繫在一起。參見胡適，〈李超傳〉，《新潮》，卷 2 號 2（1919 年 12 月），頁 266-275。

83 玄盧，〈死在社會面前的一個女子趙瑛〉，《民國日報・覺悟》，1920 年 11 月 15 日，版 2。

84 玄盧，〈死在社會面前的一個女子趙瑛〉，《民國日報・覺悟》，版 2。

當時的知識精英熱衷於將婦女問題作爲社會問題的一部分加以言說，實際上是男性知識精英將自己改造社會的理想投射到女性身上。無獨有偶，11 月 16 日的《民國日報・覺悟》上，陳望道署名「佛突」，將趙瑛之死與「結婚難」聯繫在一起，指出「趙瑛底死，原因也許很複雜。但伊想持獨身主義，想出家，從這一點也就可以想見伊對於結婚難上很有些熱騰騰的淚；這結婚難底一難題，也許就是伊死底主因。」[85] 陳望道之所以有這一判斷，源於玄廬的文章。仔細看過玄文，我們發現玄廬多從趙瑛本人遺稿或城東女校同學的轉述出發加以分析，基本能做到「以材料說話」，唯獨關於其婚姻觀的分析，基本出於無根據的揣測和推論。可能在五四知識精英的心目中，包辦婚姻占主流的時代，女子的自殺不可避免地與婚姻問題有關。於是有了這番「無中生有」的演繹。

《新婦女》也關注到趙瑛之死，編輯將玄廬的文章在《新婦女》第四卷第四號轉載的同時，刊登了與趙瑛相識的兩位務本女校學生 —— 淵若、慧奇的詩歌。[86] 一面是感慨伊人之逝、寄託無限哀思的文字，一面是玄廬對一班老先生和青年女子只會感慨「造物忌才」、「天不假年」、「命也，悲夫」的不屑。[87] 這是一個略帶諷刺的對比。同樣對於一個女子的死發表感慨，和當事人相識的人在詩歌中追憶她的品德才情，表達斯人已逝的悲傷，而與當事人素未謀面的人從社會制度層面對其死因侃侃而談，用死亡的必然性消解死者的主體性。五四時期的中國社會，男性在社會性別關係中仍然佔據主導地位。因此，無論是新聞報導還是知識精英的評論，都片面強調女性之死的社會影響，而忽略了女性本體。女學生之死，經過男性知識精英的不斷演繹，成爲表達各自不同訴求、向傳統制度和觀念發起挑戰的工具。在整個過程中，女學生雖然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她們僅僅是作爲一個符號和象徵。「女學生之死」問題的解釋權，顯然掌握在男性知識精英的手中。

---

85 佛突，〈結婚難和趙瑛底死〉，《民國日報・覺悟》，1920 年 11 月 16 日，版 4。

86 淵若，〈哭趙瑛〉，《新婦女》，卷 4 號 4（1920 年 11 月 15 日），頁 19-20；慧奇，〈哀同學趙瑛〉，《新婦女》，卷 4 號 4（1920 年 11 月 15 日），頁 20。

87 玄廬，〈死在社會面前的一個女子趙瑛〉，《民國日報・覺悟》，版 2。

總的來說，五四時期的女性知識精英通過撰寫文章、詩歌、小說等方式，以報刊媒體為平臺發出自己的聲音。她們利用女性的身份參與婦女解放的言說，向社會展現出「新婦女」作為一個群體的精神風貌。這也充分體現在《新婦女》雜誌的女性撰稿人身上。一方面，這些受新思想啓蒙的女學生模仿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理論話語和言說形式大膽發表對婦女問題的觀點；另一方面，女學生的身份和女學堂的氛圍又令她們不自覺地展現出細膩感性的話語特質和相對溫和的改革訴求。由於她們在表達態度和訴求的過程中，很難擺脫五四男性知識精英創造的主流話語的影響，以致女學生在婦女解放和社會改造方面的尷尬處境很難改變。事實上，這也是五四時期大部分女性知識精英共同的尷尬。

五、當「新婦女」遭遇馬克思

作為五四運動高潮期間專門探討婦女問題的雜誌，《新婦女》發行之初，範圍僅在上海，寄售處有亞東圖書館、群益書社、時事新報館。到第一卷第六號時，《新婦女》的代派處擴展到北京、武昌、漳州。而到了第三卷第一號時，代派處進一步擴展為上海、北京、濟南、開封、杭州、日本。第四卷第一號時又改為上海、北京、開封、杭州、長沙、日本。可見，其發行的範圍逐漸擴大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較深的大城市。同時，《新婦女》也與一些分佈在上述城市的報刊雜誌，採用交換雜誌、交換廣告的方式建立聯繫，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新青年》、《民國日報》、《建設》等。[88] 正是順應新文化運動的潮流和報刊間的互相

---

88 曾在《新婦女》上刊登廣告的報刊有《新青年》、《民國日報》、《時事新報》、《平民導報》、《國語日報》、《膠東新報》、《建設》、《教育與職業》、《學生旬刊》、《南京高師日刊》、《覺社新刊》、《通俗醫事月刊》、《童報》、《上海週刊》、《少年社會》、《雪恥週報》、《革新評論》、《批評半月刊》、《一聲雜誌》、《礦業雜誌》。在第一卷第五號的《新婦女》上刊登了《新青年》第七卷第三號的目次，相應的，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三號的〈新刊一覽〉中，出現了《新婦女》第一卷第一號的資訊。《建設》第二卷第三號上有《新婦女》第一卷第六號的廣告。《民國日報・覺悟》中縫也長期刊登《新婦女》廣告。

借力，《新婦女》最初的出版發行情況比較理想。《新婦女》第二卷第一號的「本志招登廣告」上指出「本志每期行銷六千份」。[89] 第三卷第五號的「本社特別啓事」更提到，一卷一號出版後，不上幾個月就賣完了，應各地各界強烈要求，只得再版。[90]

《新婦女》在最初半年尚能做到準時出版，不過在第三卷之後，就開始出現延期現象。[91] 之所以延誤出版，有主客觀兩方面的原因。一來，中學教員往往寒暑假不在學校共事，難免耽誤了編輯出版的週期。二來，五四運動高潮過後的國內出版發行環境日益惡化。特別是本該於 1921 年 1 月 1 日出版的第五卷第一號，直到 5 月 1 日才出版。陸秋心在該期〈五一〉一文中，對此不尋常的情況作了解釋：

> 《新婦女》自從去年五一以後，飽經了舊勢力底明攻暗擊。遠的地方，屢次受著什麼檢查員的中途掠奪。近的地方，罵詈、恫嚇、挑撥等等卑劣手段不斷地從四周來擾著我們。我們區區二十幾個社員，一本小冊子，包圍在陰慘慘黑沉沉的空氣裏，何等孤寂！何等悲哀！我們總是堅定著意志，振刷著精神，繼續向前沖決；但在我們自己底奮鬥力裏面，不免漸漸透露出幾個弱點！── 經濟困難，學識貧弱，時間恐慌。因此，出版就漸漸延期了。[92]

到 1921 年 5 月，《星期評論》停刊已近一年，《新青年》也被迫遷移到廣東。[93] 上海報刊雜誌的發行環境與「五四運動」前，已不可同日而語。而《新婦女》之所以成爲守舊保守勢力攻擊的對象，並不僅僅源於其對婦女問題的關注。如果仔細閱讀《新婦女》中對社會問題的解讀和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社會主義、馬克思的身影若隱若現。

1919 年 2 月，李大釗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二號上發表〈戰後之婦

---

89 〈本志招登廣告〉，《新婦女》，卷 2 號 1（1920 年 4 月 1 日），封 2。

90 〈本社特別啟事〉，《新婦女》，卷 3 號 5（1920 年 9 月 1 日），封 2。

91 儘管雜誌上的出版日期還是一日和十五日，但從第三卷後雜誌封面目錄上的解釋可知確實有延誤。

92 陸秋心，〈五一〉，《新婦女》，卷 5 號 1（1921 年 5 月 1 日），頁 1。

93 陸秋心，〈又到了人類節〉，《新婦女》，卷 5 號 1（1921 年 5 月 1 日），頁 36。

人問題〉，指出女權運動「帶著階級的性質」，中產階級的婦女運動與勞動階級的婦女運動不同，「中產階級婦人的利害，不能說是婦人全體的利害；中產階級婦人的權力伸張，不能說是婦人全體的解放」。[94] 不久，李大釗又把自己輪值主編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編輯成「馬克思研究專號」，撰寫〈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五四運動」爆發後，新文化運動逐漸與新興的工人運動相結合，陳獨秀將《新青年》的第七卷第六號編輯成爲「勞動節紀念號」，這是《新青年》宣傳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標誌，表明新文化運動發展至一個新階段。

受到馬克思主義宣傳及工人運動的影響，《新婦女》開始把婦女運動與勞工運動結合起來。《新婦女》第二卷第三號是勞動節紀念號，在〈婦女節和勞動節〉中，陸秋心追溯婦女節和勞動節的由來，指出從前的婦女節已經變作今日的勞動節。從這一巧合出發，陸提出勞動婦女的光榮，同時號召勞動婦女起來，要求「八點鐘工制」。在〈婦女勞動問題〉中，妙然以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爲例，指出女子與男子儘管在生理上有所差別，但在勞動工作能力方面並沒有差別。既然婦女和男子具有同等的能力、盡同樣的義務，就應當受同等的權利。又因爲女子在生理上與男子不同，政府和資本家應當曲諒女子的苦衷，規定優待女工的條件，如規定每日工作時間、廢止婦女夜工；男女同一工金，病時酌量補助；在教育、娛樂等方面考慮女工利益。特別在女工生育期間，應規定產婦休業時間，照給休業期內的工金，酌設女工保產院。在〈開通勞動界婦女底方法〉中，濟蒼提到開通勞動界婦女的方法，一是組織講演團，一是開辦女工補習學校。不過，要眞正起作用，還須同時改革勞工制。而該期的劇本〈八點〉講述了楊樹浦工廠的男女工人，在知識份子辛先生兄妹影響下覺悟的故事。陸秋心描繪了一幅知識精英啓蒙勞工的美好圖景。

應該說，這一時期的《新婦女》雖然意識到婦女勞動問題的重要性，

---

94 李大釗，〈戰後之婦人問題〉，《新青年》，卷 6 號 2（1919 年 2 月 15 日），頁 146。

涉及勞動中的階級不平等、性別不平等的問題，提出「八點鐘工作制」，但這種認識更多的是基於人道主義。在《新婦女》其他文章中，我們也可以找到馬克思、蘇俄革命等提法，顯示出社會主義思潮對五四知識階層的強大輻射力。如第二卷第四號的〈文和學的分別〉中，濟蒼認爲「馬克司學說」與中國當時的政治、經濟、教育、勞動、家庭等問題，「都是關係不小，狠應該考慮。」[95] 又如在〈就要靠不住了！〉中，濟蒼提出：

> 我以為青年底人，個個要注意的，是蘇維埃共和國底內容：一，土地不用代價，完全收歸社會公用；二，從前業主和製造家最好底房屋，都分配與工人居住；三，資本家是平民底仇敵，財產都要充公，現錢都設法掉換他出來。必然要達均衣均食均產底目的方罷。只有技師和專門學家，狠為優待。一天不做工底人，一天不應該得食。這種辦法，已佈滿俄羅斯全境。歐洲各國，和美國日本，傳佈這主義底人，一天多似一天。福建漳州底地方，已經仿照他辦理。就使有人要反對他，防止他，恐怕和前清末年，嚴禁革命黨，得一樣底結局呢！[96]

當然，《新婦女》和馬克思的結合，前期主要源於編輯群對五四新思潮報刊和各類西方論著的閱讀，後期主要歸功於一些具社會主義傾向者的加盟，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沈玄廬和陳望道。

翻開 20 世紀 1920 年代上海的一些進步雜誌，署名「玄廬」的作品頻頻出現在我們眼前，他就是沈定一。沈定一，原名宗傳，號玄廬。沈玄廬文采斐然，曾是《星期評論》的主編之一，同時也是《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的主要撰稿人，發表了大量的評論、詩歌等，在當時的文藝界名噪一時。今天，我們稱沈玄廬爲「婦女解放的積極宣導者」，主要因爲 1921 年他在廣州創辦了《勞動與婦女》雜誌，同時在指導蕭山衙前農民運動期間，積極進行婦女解放的實踐。但事實上，早在 1920 年的

95 濟蒼，〈文和學的分別〉，《新婦女》，卷 2 號 4（1920 年 5 月 15 日），頁 2-3。
96 濟蒼，〈就要靠不住了！〉，《新婦女》，卷 3 號 1（1920 年 7 月 1 日），頁 1-2。

《民國日報・覺悟》和《新婦女》上，沈玄廬就曾發表多篇提倡婦女解放的文章，如〈婦女解放途中底「浮蕩少年」〉（《民國日報・覺悟》1920 年 9 月 15 日）、〈兩種制度下面底婦女〉（《新婦女》第三卷第六號）、〈婦女問題中底一幕〉（《民國日報・覺悟》1920 年 10 月 21 日）、〈死在社會面前的一個女子趙瑛〉（《民國日報・覺悟》1920 年 11 月 15 日）等。玄廬在《新婦女》第三卷第六號中寫有〈兩種制度下面底婦女〉，提出「凡是受現制度支配下底婦女（經濟制度、夫婦制度），制度一天不廢棄，就得吃一天痛苦。無論文化運動怎樣熱鬧，解放聲浪怎樣偉大，顛來倒去，只是這個黑魆魆地世界中間底鬼把戲，決計得不到一點實惠的。」[97] 某種程度上，這篇文章和他在《民國日報・覺悟》上發表的〈婦女解放途中底「浮蕩少年」〉秉持同一個理念，即「人類之半的婦女，被壓迫在階級的經濟制度最下一層。階級的經濟制度一天不打倒，兩性問題內容底全部一天不顯露。」[98]

其後，近代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旗手 ── 陳望道也加入到了《新婦女》作者的行列。陳望道在五四時期，撰寫、翻譯不少有關婦女問題的文章，發表在《新青年》、《星期評論》、《勞動界》和《民國日報・覺悟》上，尤以《民國日報・覺悟》最爲集中。[99] 成爲《新婦女》撰稿人後的陳望道，先後發表了〈我想〉、〈文藝上各種主義〉（譯作）、〈婦女運動和勞工運動〉三篇文章。在〈我想〉中，陳望道提及「第四階級女人運動」概念：

> 「女人運動」共有兩大類：一是第三階級女人運動；一是第四階級女人運動。第三階級女人運動，就是中流階級底女人運動；第四階級女人運動，就是勞動階級底女人運動。
>
> 這兩類運動，宗旨很是不同，萬不能淆混牽扯。簡括說來，

---

97 玄廬，〈兩種制度下面底婦女〉，《新婦女》，卷 3 號 6（1920 年 9 月 15 日），頁 3。

98 玄廬，〈婦女解放途中底「浮蕩少年」〉，《民國日報・覺悟》，1920 年 9 月 15 日，版 1。

99 詳可參考陳望道，《戀愛　婚姻　女權：陳望道婦女問題論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 第三階級女人運動，目標是在恢復「因為伊是女人」，因而失掉的種種自由和特權；第四階級女人運動，目標是在消除「因為伊是窮人」因而吃受的種種不公平和不合理。所以第三階級女人運動，是女人對男人的人權運動；第四階級女人運動，是勞動者對資本家的經濟運動：宗旨很是差異，要求也不相同。
>
> 第三階級女人運動，要求的是男女平權。所以這種運動，最致力的就是反對男女區別；想攻擊優待男人的宮室，要揭去監禁女人的封條。在教育上，就有男女同學的要求；在政治上，就有女人參政的要求；在社交上，就有自由交際的要求；在婚姻上，就有自由擇配和新貞操說的主張。這種運動，總之是想消除一切科罰「女人」這罪名的刑罰。
>
> ……
>
> 但須忌的：這種運動完全達到目的，得到的也只是有產階級裏的男女平等，卻並不是「人類平等」。
>
> 要得到「人類平等」，還須另外給一點注意在第四階級女人運動，就是勞動者對資本家的運動上面。[100]

這一帶有濃郁馬克思主義色彩的宣傳，將婦女納入社會主義革命的陣營中，比玄廬的說法更進一步、更明確。在第五卷第一號的勞動節紀念號上，陳望道重申對第三階級婦女運動的擔憂，提倡第四階級婦女運動，並呼籲男女攜手努力於勞動運動、經濟改造，共同造出男女合作共用的社會。[101]

顯然是受到陳望道文章的影響，《新婦女》雜誌開始頻繁使用「第四階級婦女運動」這一概念，特別是在第五卷第一號的勞動節紀念號上。在〈五一〉一文中，陸秋心在陳望道觀點的基礎上提出：

> 我們認定那明攻暗襲我們《新婦女》的大敵，就是人類底大

100 陳望道，〈我想（二）〉，《新婦女》，卷 4 號 4（1920 年 11 月 15 日），頁 1-2。

101 陳望道，〈婦女運動和勞工運動〉，《新婦女》，卷 5 號 1（1921 年 5 月 1 日），頁 13-16。

> 敵。我們要打倒這大敵，一定要從第三階級婦女運動做到第四階級婦女運動，才能夠得到勝利。照世界大勢看來，單單的第三階級婦女運動是靠不住的；照中國現勢看去，單單的第四階級婦女運動是掀不起的。[102]

既然是對階級分析法的運用，「馬克思主義」便堂而皇之地進入《新婦女》的話語系統中。除了有陸秋心在文章中對馬克思的言論引經據典，妙然撰寫〈馬克斯學說和婦女問題〉，從家世、學業、人格和學說等多方面介紹馬克思，著重探討馬克思關於婦女生產力、婦女生產價值及其勞動地位的理論。文章最後，妙然對馬克思的理論表現出極大的贊同，感歎「馬克斯是一個爲吾們引道的人」。[103]

應該說，《新婦女》第五卷第一號上關於馬克思學說的內容，早在《新青年》等新思潮雜誌上出現，並不新鮮。但對於一本專門研究婦女問題的雜誌，這仍是一次充滿勇氣的嘗試 —— 堂而皇之地出現馬克思主義色彩鮮明的標題、所有撰稿人以全名示人。目前可見的最後一期《新婦女》是第五卷第一號，由於這是《新婦女》闊別已久的復出，卻又再次沒有後續，容易使人產生「因該期過於激進而被叫停」的印象。事實上，《新婦女》的停止出版歸因於一些偶發事件。1921 年 5 月 24 日的《民國日報・覺悟》中縫刊登了〈新婦女社特別啓事〉：「我們底《新婦女》，向由國光書局承印。第五卷第二號稿早已發出；不料該局失火，以致本期原稿（和前四卷紙板）統被燒去。現在只得重行擬稿，一面另找印局趕快出板。」[104] 可惜後來《新婦女》再也沒能續出。於是，這種對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關注，僅是勞動節紀念號的特例，還是將成爲《新婦女》的新主題，我們便不得而知了。但《新婦女》畢竟開創了一個先例 —— 第一本宣傳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婦女刊物。這也使得這份歷時不長、影響有限的雜誌，得以留名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記憶裡。

---

102 陸秋心，〈五一〉，《新婦女》，卷 5 號 1，頁 2。

103 郭妙然，〈馬克斯學說和婦女問題〉，《新婦女》，卷 5 號 1（1921 年 5 月 1 日），頁 12。

104 〈新婦女社特別啟事〉，《民國日報・覺悟》，1921 年 5 月 24 日，版 3-4。

六、結　　論

1915 年是近代中國期刊發行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引導近代中國新文化思潮的旗幟《新青年》雜誌在這一年誕生。巧合的是，近代中國歷時最長的一份女性期刊《婦女雜誌》也於同年創刊。創刊於同一年的《新青年》和《婦女雜誌》，在引領一個時代的婦女觀方面都曾具有特殊的影響力。值得玩味的是，當五四高潮剛剛過去的 1920 年，無論是《新青年》還是《婦女雜誌》都沒有在婦女啓蒙方面有新的建樹。《新婦女》的出現恰恰填補這一空缺。《新婦女》以西方女權主義的理論解讀中國婦女長期以來的生存狀態，提出打造新婦女以改進現社會的設想，並通過論說文、詩歌、小說、劇本等多種形式傳播理念，更在後期出現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儘管《新婦女》的文章所透露出的理論張力不能媲美《新青年》，且由於刊行時間較短，從近代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長期脈絡和實際影響來看，也不能與《婦女雜誌》相提並論。但其卻以深入淺出、清新親合的特點征服了以女學生爲主的廣大受眾，成爲五四時期可圈可點的新文化期刊。

《新婦女》雜誌對於動態解讀五四婦女解放思潮的眞實情況，有著特殊的價值。一方面，近代中國的婦女報刊，伴隨女學的興起而產生。女學是女性啓蒙的園地，女報便是啓蒙女性的養料。在五四前後的中國女性報刊中，女校校刊佔據重要的比重，往往以其溫和的立場、豐富的內容、清新的風格展現女校的辦學水準和女學生的時代風采。誕生於 1920 年的《新婦女》，既追求新文化報刊的價值和意義，又呈現出女校校刊的獨特氣質，成爲可以全面解讀五四婦女解放思潮實際情況的樣本。另一方面，五四時期大量湧現的同人雜誌，多是對《新青年》等報刊中傳播的新文化思潮的自覺反饋。《新婦女》的編輯群是一群接受五四新文化啓蒙的知識份子，從辦刊到論說文、詩歌、小說表現出強烈的啓蒙意圖，到被批評理論水準有限，都是五四新文化傳播過程中的動態特徵；

而這些「被啓蒙者」又扮演了「新的啓蒙者」的角色，成爲女學生接受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導師。《新婦女》讓我們在五四新文化的大潮中，聽到來自女學校、女學生的聲音 —— 對教育平等、戀愛自由、社交公開等的強烈願望。儘管這種表達充斥著男性知識精英話語的影響，但這何嘗不是一個眞實的啓蒙過程？即使是雜誌發行後期出現的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學說，其本身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新婦女》話語變化影響的動態表現。從傳播史的角度而言，《新婦女》有著獨特的研究價值。

《新婦女》在前期立足於從西方自由主義婦女運動思潮出發打造中國社會的「新婦女」形象，後期開始宣傳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學說。早在五四運動前夕，李大釗就在《新青年》上以階級劃分法將婦女運動分爲中產階級和勞動階級。[105] 其後，沈玄廬、陳望道等人在《新青年》、《星期評論》、《民國日報・覺悟》上相繼發表過不少體現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文章。不過，第一份以婦女期刊形式提倡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雜誌是《新婦女》。在此之後，《勞動與婦女》、[106]《婦女評論》、[107]《婦女聲》、[108]《婦女週報》[109] 等相繼誕生，這些雜誌的編輯或撰稿人多少

105 李大釗，〈戰後之婦人問題〉，《新青年》，卷 6 號 2，頁 146。

106 《勞動與婦女》為四開四版小報形式的週刊，1921 年創刊於廣州，前後出版 11 期，主要撰稿人有沈玄廬、陳獨秀、譚平山、陳公博等人。期刊旨在向勞動群眾與被壓迫婦女進行宣傳教育，呼籲勞動界與婦女團結起來共同鬥爭，消滅不平等的階級制度，以求自身的解放，還闡述勞動創造世界的道理，介紹蘇俄十月革命的情況，帶有鮮明的無產階級解放性質。

107 《婦女評論》作為「民國日報」的副刊，1921 年 8 月創刊，共出版 104 期；編輯撰稿者多為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分子，如陳望道、邵力子、沈雁冰、楊之華等。期刊批判狹隘的女權思想，主張被壓迫婦女與無產階級攜手奮鬥，比較關注工人運動，尤其是女工的生活及鬥爭情況。《婦女評論》形式多樣，有論文雜評、文藝作品、通訊隨感、書報介紹等，發行量大，鼓動性強，有相當影響力。

108 《婦女聲》半月刊為四開四版，創刊於 1921 年 12 月，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進步婦女刊物。中共黨員與進步知識份子陳獨秀、沈澤民、沈雁冰、邵力子、李達等都為其撰寫過文章。《婦女聲》著重討論婦女運動問題，認為知識婦女與勞動婦女相結合，通過革命手段，推翻原有的社會組織，才能求得婦女解放，並以唯物史觀闡述婦女問題，把它提升到理論高度。《婦女聲》還大量報導國內外婦女運動概況和國內女工罷工鬥爭，介紹十月革命情況，不僅給被壓迫婦女指出鬥爭方向，還針對具體情況作出決策，是中國共產黨初期出色的宣傳刊物。

與《新婦女》雜誌有些淵源。以《新婦女》爲首的這些帶有馬克思主義色彩的婦女報刊，開啓了近代婦女解放思潮的新階段。

109 1922 年，《婦女評論》的姊妹刊《現代婦女》創刊；1923 年，兩刊停刊，改組出版《婦女週報》。《婦女週報》提出「婦女運動的對象決不在乎男子，而在乎社會制度」，號召婦女「與一切被壓迫階級的男子攜手，共同推翻現在的經濟制度」。它密切配合當時的政治鬥爭，提出婦女運動的方向和任務，熱情歌頌十月革命，介紹蘇俄婦女情況，把中國婦女運動與國際鬥爭緊密結合，是頗具革命性的婦女刊物。

Studies on the May Fourth Journal *Xin funü* (*New Women*)

Fei Yao

Abstract

Xin funü, which was published during the May 4th period, used Western feminist theory to understand Chinese women's lives. The editors discussed marriage, family, labor issues—all topics that were popular in the May 4th period—through essays, poetry, fiction, drama, and other textual forms, and advocated the creation of new women in order to improve Chinese society. In later volumes, *Xin funü* advocated Marxist theories of the emancipation of women, thus becoming the first women's magazine in China to advocate a Marxits view of women.

After carefully analyzing *Xin funü*, I conclude that the magazine has thre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First, although the magazine can't be compared with *Xin qingnian* in theory or *Funü zazhi* in actual effect, it attractged female student readers by explaining profound theories in simple language and fresh and friendly form. It thus became a notable New Culture movement periodical. Second, since it also possessed something of the temperament of a women's school newsletter, *Xin funü* exemplified the real situation facing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the May 4th period. Last but not least, *Xin funü* was a conscious response to the ideas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at were being disseminated i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such as *Xin qingnian*. As new intellectuals themselves enlightened by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editors in turn sought to enlighten female students and become their ideological mento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ale intellectual discourse, female students

expressed their strong desire to equal education with male students, self-determination in love affairs, freedom of social contact, and other radical ideas. This represented a real process of enlightenment. Even the appearance of Marxist theory was also a reflection on how the ideological trends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influenced the changing discourse of *Xin funü*. From the viewpoint of communication history, *Xin funü* has unique research value.

Key Words: *Xin funü*, *New Women*, May 4th enlightenment, gender discourse, Marxist theory of the emancipation of women